

北海文史

第一辑

一九三六年“北海事件”始末

中共北海市委党史办公室

一九三六年九月三日，广东西部的港口城市北海(今属广西)发生了日本间谍中野顺三被杀事件。事件发生后国内外引起很大的震动，国内各大报纸纷纷在头版刊登这一消息，短短几天内“北海事件”成了全国舆论的中心，并导致了中日两国政府间的外交纠纷。

“北海事件”政治背景简介

1、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经过长征已于一九三五年秋到达陕北，建立了巩固的革命根据地。鉴于国民党反动派继续推行“剿共一卖国政策，中共中央于该年十一月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中国宣言》，二十八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抗日救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蒋抗日。党的这些主张，得到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拥护。

2、十九路军在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以其英勇善战闻名于世。此后，日本侵略者对他们又恨又恐惧，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的国民党蒋介石对十九路军的存在更是不安，千方百计要瓦解它，在国内外敌人的逼迫下，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九路军被迫解散，军中人员俱遭遣散。一九三六年六月，两广首脑人物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发表反蒋的“六一宣言”，李、白还支持李济深、蔡廷锴在广西恢复十九路军以共同反蒋，蒋介石则一面派军南下压迫两广，一面玩弄权术拉拢广东第四路军总司令余汉谋，策反广东空军，削弱了陈济棠，使陈被迫下台。这样广西的李、白便孤掌难鸣，哄动一时的粤桂反蒋顿成泡影。

十九路军(据说当时又称“抗日纵队”)重新恢复以后，我党派往广西工作

的宣侠父(共产党员,当时叫宣古渔)同志(注1)利用在广西绥靖公署任上校咨议职位之便利,积极做十九路军高级将领如李济深、蔡廷锴、翁照垣等人的统战工作,推动他们进行抗日反蒋。该纵队司令兼六十师师长翁照垣(一说只担任师长职)受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于五月末曾撰文大声疾呼:“抵抗是唯一的出路”。(注2)表明其要求实行民族抗战之心志。此时,翁曾聘请宣侠父为其参谋长,宣虽没有正式接受,但积极参与十九路军的活动,实际上已起到了翁照垣“政治参谋”的作用了。(注3)由于十九路军的反蒋抗日态度,许多爱国军人和进步青年纷纷表示拥护,并踊跃投军,使该部队充满革命气息。

3、北海是一个开放港口城市,海路交通发达,北海又是一个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共产党人在这里英勇斗争的精神在学生、工人、渔民中有很深的影响,进入三十年代中期,北海的学生运动就非常活跃,成立了许多读书会,阅读进步书籍,追求革命真理,开展过一系列的抗日救国活动(如查禁销毁日货,声援全国的抗日运动)。十九路军进驻北海后,如鱼得水,很快就掀起了反蒋抗日的高潮。

十九路军进驻北海的一些活动

八月,十九路军正式进驻合浦北海前,曾派政工队先期到达北海,即在大街上刷写“打倒日寇”、“打倒卖国贼蒋介石”等大标语。合浦一中(今北海中学)学生周志刚、程敏德等人目睹这一激动人心场面,出于爱国热情,自动买鞭炮燃放以示欢迎。此事为六十一师师部秘书张梅生(注4)知悉,即到合浦一中找学生联系,后来张还与张凤楼(原中山大学学生,“中青”成员)、曾眉、何鸣等数名政工队队员搬进一中学校旁的“东方园”居住,与一中进步学生保持密切往来。张梅生于一九三三年在东北抗日同盟军时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四年在团中央组织部工作,后于上海被捕,一九三五年底出狱后,虽然失去了组织联系,但由于其政治理论水平较高,斗争经验丰富,革命意识浓厚,仍自觉进行革命工作,深得北海青年学生的信任。在“东方园”里,张梅生曾多次与北海进步青年赵世尧、冯廉先、吴世光、庞国泰等人彻夜长谈,深入了

解北海当地的学生运动和抗日救国群众运动的情况，并和学生们共同分析探讨当时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在分析形势时，张梅生指出：由于日寇侵略东北后，要继续霸占全中国，民族危机日深，全国的抗日救国运动掀起高潮，但蒋介石还继续推行卖国政策，只有组成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救亡图存。张梅生还提出了“全民总动员，参加抗日救国斗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实行对日抗战”等口号。有时张梅生还通过赵世尧，召集一中的活跃分子开座读会，参加的人有冯廉先、吴世光、庞国泰、廖世儒、王文昆、庞文隽、傅善熙等。由于张梅生做了工作，赵世尧、冯廉先等青年学生骨干认为十九路军是比较坚决反蒋抗日的，便决定发动全市学生和各界群众支持他们的抗日行动。

此时，翁师的一位团长，进步军人钟俊生(抗战后，曾到延安参加抗大学习)，奉命接管地方政权，任北海市政筹建处主要负责人。钟曾邀请赵世尧参加接管工作，并委赵担任教育科科长之职，以便于联络全市各中小学师生，发动他们参加各种抗日救国活动，教育科科长由师部派出的政工人员翁绍志(绰号“翁大猪”)担任，钟、翁的政治倾向都是反蒋抗日的。

十九路军正式进驻后，北海各界群众发起了热烈的迎军活动，在张梅生、赵世尧的指导下，由北海一批先进青年去发动组织工人、市民、渔民和学校师生共数千人汇合在中山公园召开了“北海各界民众欢迎抗日英雄翁照垣暨抗日救国誓师大会”。大会由张梅生、钟俊生主持，赵世尧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会上翁照垣讲了话，号召各界民众团结抗日。赵世尧代表北海民众讲话，号召全市各界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十九路军的抗日救国行动”。这个大会声势浩大，军民团结抗日气氛浓烈，对北海人民产生很大的影响，北海地区的抗日救国运动随之高潮。

秘密调查日本间谍中野顺三

为了深入做群众工作，十九路军的政工人员张梅生、丘东平(抗战后参加了新四军，一九三九年在新四军一支队政治部任敌工科科长兼陈毅的对外秘书，后任新四军鲁迅艺术学院分院院长，一九一一年在苏北盐城战后中牺牲。)张风楼

等纷纷深入到群众中去，宣传抗日救国道理。通过与群众广泛接触，十九路军获悉北海“丸一药房”日人老板中野顺三有间谍行为，便进一步予以调查。

据查，中野顺三于清末来到北海，二十余年间由一个青年日本浪人变成一个家道殷实、广发贷款的药房老板，并娶了本地两名妇女为妻妾，生有子女八人。药房内雇有本地店员数人，药房生意虽不大好，但他的家庭生活却很好。这个药房是香港日本丸一药行的支店，一应货物包括许多生活用品均由日本轮船运来，经营货物主要是日本制的成药(以木虱药、“大学眼药水”为大宗)，也兼售儿童玩具和其他外洋产品。中野本人因长期居住北海，通晓当地方言，他平日很少在店，常以打鸟、钓鱼为名，足迹遍及北海沿海，或测绘地图或测量港口航道水深及记录海港潮汐等情况，每当日本军舰或轮船来港或途径北海，他们的店内便充斥日本军官、商人、船员等，其时本地人是不准入内的。中野还订阅大量的中文书刊，并经常阅读日轮送来的日文书刊，据当时北海海关一职员说，中野一切行动听令于日本政府，“每年受政府津贴千元，每星期例须向本国政府作一二次报告，其家有密室一所，虽妻妾子女亦不许入，报告多作于是”。(注5)

刺杀中野顺三经过

1、组建便衣行动队

通过调查，十九路军认定中野顺三有间谍行为，为了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造成蒋介石政府的外交困难，翁照垣等将领决定刺杀中野顺三，并发动群众运动，以振军威，便亲自指定张梅生去主持该项任务。

于是，在张梅生的策划下，从师部精心挑选二人来到北海，住宿在旅店，专门负责执行刺杀任务；此外，张梅生还从北海驻军挑选数人组成便衣行动队，配合师部派出二人执行此任务。

十九路军驻北海的兵力为一个营，共三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营长区海文(广东罗定人)。区海文接到翁的命令，认为事情重大，就找来同乡、机枪连排长区白兴商议，区白兴推荐了机枪连的一个班长周大强。周大强原名周怀路，

是合浦营盘乡人，曾参加淞沪抗战，十九路军解散后流落广州。此次闻十九路军重整旗鼓，便再次从戎。周大强听说要杀一个日本间谍，即欣然应诺。通过周大强，还找了一个姓刘的班长和一个士兵。这样，由师部两入、区白兴、周大强、刘班长、一士兵，再指定该营一名付营长负责指挥，组成了七人的便衣行动队，每人配备一支驳壳枪，一把匕首，具体执行刺杀中野任务。

由于中野居留北海二十多年，俨然一个“北海通”，再加上他又善以小恩小惠笼络本地居民，人缘不错，便衣队要探听中野行踪，若通过一般市民这个途径，很容易惊动中野本人，所以张梅生认为不宜直接向丸一附近居民商户调查，以免打草惊蛇。另外，十九路军进驻北海后，曾于八月二十四日通知中野等外侨离境，中野顺三此时已成惊弓之鸟，终日闭门谢客，足不出户，数天过后见没有动静“丸一药房”才又稍开门户，作少许买卖，这样，便给便衣队的调查增加了困难，最后便衣队在市税务所通过打牌、闲谈等方式，才摸准了中野家的内部情况(包括房屋结构及周围环境等)及中野的外貌特征。

对这次刺杀行动，翁照垣曾明确规定：(1)只许杀中野顺三一人，其余均不得伤害，并绝对不准杀错；(2)“丸一药房”及中野家中一切财物，小至一个铜钱均不准拿走，有一人违犯，即将七人处死；(3)刺杀中野一般不准开枪，但若遇警察、宪兵阻挠刺杀行动时，可开枪还击……还答应事成之后，奖赏七人三千元。

当一切准备就绪，行动在即时，翁照垣却于八月二十八日再次着令派入通知中野离境，这实际是翁照垣的“欲擒先纵”的手法。

2、杀中野顺三的经过

九月三日下午七时左右，正是晚膳时间，北海街上行人稀少，奔波了一天的黄包车夫大都在街边骑楼下歇息了。东华街(现珠海中路)“丸一”药房骑楼下亦停有数辆黄包车。此时，“丸一”药房大门紧闭，掌柜庞伯达(北海人)在用过早膳后刚离店回家，药房只有一个姓黄的店员及中野儿子中野居士等数人在照料。这时，便衣队一行七人悄然来到药房前，赶走昏昏欲睡的黄包车工人，

敲门诡称买药，门一打开，五个便衣队员一涌而进，只留二人在门外把守，这五个便衣队员装作买药，挑来拣去，后来中野居士问：“你们究竟买什么药？”便衣队中有人即勃然发怒，骂道：“丢那妈，你们这些统统是日本货！”随即与中野儿子争吵起来，中野其它家属也闻声从屋内走出，独不见中野，便衣队即拔出手枪逼住中野家属，禁止他们走动，又留下两名队员看守他们，周大强及师部二人即切断屋内电源，一手持枪，一手持电筒直奔药房楼上。

楼上中野卧室，中野正与小儿晚膳，电灯一熄，他正欲下楼询问，便衣队已来到他面前，三支电筒光束照得他睁不开眼，在电筒光下，便衣队看到一个五十开外，头发花白的胖子，穿一身中式便服，正与所调查的中野特征相符，中野正在惊慌中，师部所派队员之一即上前一步，一手抓住中野后衣领，中野自知不妙，连忙用廉州话喊道：“我无是日本人呀”，不容他再声张，三人一齐上前，结果了这个日本间谍的狗命。

周大强等三人收拾了中野之后，马上下楼，按事前约定之讯号，“啪啪”用手掌击了两下，便衣队七人汇集铺前，在夜幕的掩护下沿东华街往东扬长而去，当他们出到大街上时，听到中野家人高呼：“捉贼呀！”他们并不理会，周大强等三人按原计划直奔税务所，在所里早有区营长派人送来了军衣，他们脱下便衣换上军装后，分别坐上黄包车，各归营房去了。

事后翁照垣师长果然应诺，把三千元“东纸”（广东银行发行的纸币）奖赏给便衣队七人。

案发之后

当晚中野家属报警后，警察即鸣笛缉“凶”，北海公安局巡官郝叔修赶到现场，主持该案。此时，警察发现有一人惊慌失措，沿海滩狂奔，便即追捕并抓获归案，后经公安局长陈镇审问，始知是“丸一”药房一姓黄的店员，因当晚受惊而从屋后窜出海滩，由于没有嫌疑，当夜十二时便予释放。

次日，陈镇自合浦师部汇报回来对郝叔修说：“翁师长有令，凡中野之亲朋，一律要软禁，以防意外，”要郝在最僻静的九曲巷一带拔一所严密的房子，

将中野家属拘禁起来，不准透露一丝风声，要求在三小时内办妥。郝叔修接到命令，认为这样做太苛刻，担心将来事发自己无法交代，主张妥善安置，后来他在市郊神棍李大姑家，觅到一个安静处所，将中野遗属安顿下来，加以保护。

不久，陈镇又传达翁师长命令，要郝将中野尸体载出冠头岭外海面，沉尸灭迹，郝又认为这样做不妥，将来日方代表前来交涉时难以交代，便自作主张另择爱生院左侧基地土葬，此事过后几天，陈镇又传翁师长命令，让他放出中野家属，任其自由活动，郝即照办。

中野被杀后，次日，当地报纸即登载一段日本间谍中野顺三昨日被刺的简单报道，消息传开后，北海民众议论纷纷，认为中野死有余辜。张梅生此时也到一中召集部分学生开会，讨论当前局势及布置组织北海抗日救国会的问题，决定先筹备成立北海学生抗日救国会，临时推选赵世尧、庞国泰、吴世光等人负责，还决定派人到码头工会、驳艇工会等处联系，推动他们成立抗日救国组织，会上还决定以“北海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名义进行活动。后来，当国民政府驻两广外交特派员秘书凌士芬到北海调查时，在张梅生、赵世尧等人的策动下，北海掀起了反蒋抗日的新高潮。

第一次调查的经过

中野被刺后几天，消息传到广州、香港，顿时引起哄动，日本方面即向国民党外交当局提出抗议。

同月八日上午，蒋介石在广州黄埔行营召见外交部驻两广特派员刁作谦及其秘书凌士芬，询问此事，并嘱即与广东第四路军总司令余汉谋研究，必要时立即派人前往调查等语。刁作谦、凌士芬即奉命与余汉谋商议，事前广西李宗仁也曾将此事电告余，但详情尚未得知。

同日上午，日本驻广州总领事中村到外交特派员公署拜会刁作谦，质问此事，并威胁说日方拟派飞机前往调查，遭拒绝后，中村表示仍需派军艇前往。九日，日本单方派出军舰“嵯峨号”开赴北海，此时，刁作谦认为情势紧迫，即指派凌士芬赶赴北海调查此案。

九月九日下午，凌士芬偕同第四路军总司令部科长沈铎，广东省府秘书杨秉离，江防司令部参谋张忠燧、班即经、尹毓蕃及八名宪兵，往黄埔登上粤海军舰“福安号”，下午五时启航，兼程前进，十二日上午九时，“福安舰”赶在日舰之前抵达北海，当时凌士芬等人想登陆与驻军接洽，便乘海关电船前往，将近海关码头时，岸上驻军即架机枪相向，迫令凌等回舰，随后，翁照垣派其政训处长陈汉流及张梅生前往“福安舰”与凌交涉，始同意凌等五人登岸。

凌士芬登岸之前赵世尧等在张梅生的布置下，以“北海市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名义在中山公园召开了“北海各界民众反对蒋介石政府亲日卖国外交政策动员大会”，发动全市学生、码头工人、驳艇工人和各界市民到海关码头抗议凌士芬到北海调查。此时，在海关码头一带，六十师广为布防，在沙滩上挖了一个个坑作掩体，士兵荷枪实弹严阵以待，气氛颇为紧张。

当凌士芬等五人在陈汉流、张梅生的陪同下登岸时，北海数千群众，将海关码头一带至中山路的街道都塞满了，示威群众手持红绿三角小旗，旗上书写各种反蒋抗日的标语，还不断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屈辱外交”、“打倒卖国贼蒋介石”、“打倒日本侦探”、“打倒日本走狗”、“打倒汉奸”、“不准调查”、“武装保卫北海”、“北海是我们的”……在凌士芬此次调查之始终，口号声不绝于耳，声声震撼着这愤怒的滨城。

谈判是在北海市政局(设在旧卑路楼，即今北海二小处)进行的，代表北海的是翁照垣的参谋长丘国珍及代理合浦县长林宗汉。当他们听说日舰将至，日方企图登岸调查时，丘国珍明确表示，绝不容许日方登岸调查，并说若日本军舰强行登陆时，一定予以炮击。

谈判过程中，示威群众将市政局团团围住，水泄不通，还强烈要求凌士芬出来答复种种问题。凌士芬出见，群众便纷纷向凌递交请愿书、抗议书，并涌进会客室内示威，后经协商，群众便推选赵世尧等七名代表与凌进行谈判。赵世尧等代表北海市民，愤慨陈词，指斥凌某说：北海死了一个日本佬，你们便积极来调查，但我国东北、上海死了那么多的同胞，你们为什么不去调查？还说，

中野顺三在北海二十多年，平日专从事侦察我国虚实，是一个日本间谍，死有余辜，代表们纷纷要求凌士芬以调查本案之精神，转而调查东北被杀同胞，代表还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撤退南下之师，北上抗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些实际上都是共产党的主要及口号。此期间，群众代表还多次到卑路楼上走廊处用喇叭筒向群众介绍谈判情况，群情甚为激昂。最后，代表质问凌等五人：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你们对日本侵略中国持什么态度？你们是拥护还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迫使凌士芬承认杀死中野是正当的举动。最后，代表们要求凌士芬一行参加北海群众所举行的抗日救国示威大游行，遭到凌的拒绝，于是，便愤而宣布谈判结束，命令他们滚蛋。

凌等返航途中，群众依然挤满马路。此时，凌等在前开路，群众示威队伍尾随不舍，队伍前头还抬着一大横幅，上书“一致抗日”四个大字，沿途口号声不绝，声势颇为浩大，客观上迫使凌等充当示威队伍的前导了。后来，当凌等登上交通艇时，有些群众还投之以沙、泼之以水，以示愤慨之情。

这是北海人民抗日救国力量的一次大检阅，是反对国民党政府屈辱外交的一次大示威！凌士芬等对此情此景，耳闻目睹，不免胆战心惊，返“福安舰”后余悸犹存。慑于北海人民反蒋抗日情绪之高涨，他觉得在目前情况下，调查是势难以进行的，加上考虑到日军舰“嵯峨号”万一贸然驶入北海口岸，双方发生冲突，情势必更趋恶化，遂决定回航寻找日舰，以免再惹事端。于是，便于即日下午驶离北海，不久，与“嵯峨舰修相遇，凌士芬说明厉害，力劝日调查员返航。

六十师撤退前的措置

凌士芬第一次调查不果，于同月十二日狼狈归省。不久，形势剧变。首先是九月十四日，李宗仁、白崇禧发出和平通电，与蒋介石妥协，并电令十九路军撤退，接着，蒋介石指令余汉谋部之谭邃、巫剑雄两师向南路推进，企图逼走翁照垣，蒋介石还指令，若十九路军不撤走时，将以武力解决。大敌当前，十九路军自忖寡不敌众，便部署部队向钦州撤退。

撤退之前，张梅生在合浦一中学生宿舍邀集赵世尧等青年骨干开会，商议善后工作。张梅生指出：(1)蒋介石利用广东军打十九路军，翁师如不撤退，双方火拼，对抗日反蒋不利。(2)翁师计划撤往钦防十万大山，搞武装抗日根据地，因该地处于粤桂两省及中越两国交界，有复杂的山区地形，进可攻，退可守，还可打通国际上的联系，取得国内外的声援。(3)要求动员一批具有抗日爱国思想的青年学生参军，充实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力量。(4)要求留在北海的青年学生多做群众工作，深入开展抗日救国运动，以备十九路军回师反击之需。会后，冯廉先、王文昆等十多二十个进步青年学生积极响应张梅生的提议，踊跃投军，安排在政工队工作。北海学生随军到达钦州后，驻在县城中山公园处，每天进行军事训练、政治训练，当时由宣侠父负责对他们进行政治训练，准备分配到各连队去任政治指导员。后因十九路军内部意见不统一，屈服于蒋、桂系的压力，继续向南宁撤退，大有改编为广西军之趋向，这批学生兵便大都返了北海。

十九路军撤退时，张梅生、钟俊生布置赵世尧留在合浦，协助翁绍志工作，任务有二：一是派人监视了解广东军谭邃师的动向；二是深入做群众工作，准备翁师重返合浦、北海时进行策应援助等。在此期间，赵世尧曾协助翁绍志做过一些情报工作、群众工作。后闻十九路军逼于李宗仁、白崇禧之命，继续向南宁撤退，前程不妙，他俩也先后离开北海赴穗、港去了。

第二次调查简况

凌士芬于同月十五日返广州后，正拟向蒋介石汇报；但尚未往见，便接当局报告，说一五九谭邃师正向北海推进，十九路军撤退在即。于是，凌便奉命会日方调查员乘军舰赴北海调查，十七日启航，十九日晨抵北海，泊在冠头岭外，等待翁师撤退。当时泊于此地的军舰有粤海军的“福安号”、“通济号”及日舰“嵯峨号”。此外，海口方面尚有六艘日舰，分别为：巡洋舰“球摩号”、一等驱逐舰“太刀风号”、二等驱逐舰“若竹号”、“刈萱号”、“朝歌号”、“芙蓉号”。此六舰二十二日晨亦驶泊冠头岭处，进行武力威胁。

二十二日晨，一五九师参谋长许让玄偕北海士绅刘瑞图乘海关小电轮到“福安舰”会见凌士芬，至此，凌士芬始知翁师确已撤走，谭邃师已进驻北海，于是，经与许、刘商议后，即过日舰知会日方，并规定了几条：(1)只许“嵯峨号”入口，并须于事前将登岸人员名单开列，待我方通知后始得登岸调查；(2)日登岸人员绝对不许配备武装及携带照相机；(3)调查时，须按我方指定路线进行，非指定路线，概不能行走……这些条件，在日本方面本来是不容易接受的，但在当时形势下，日本却不得不接受。

二十三日晨八时，中日双方调查员会同登岸调查。日方代表为：调查员户根木长之助、松浦弘人及粤语翻译、医官、海军军官等共八人。双方登岸后，即乘一五九师所备汽车前往肇事地点。该汽车是向北海普益汽车公司租的，汽车工人知道是让日本人调查时坐的，便事先将汽车的活动窗门(木板做的)钉死了，所以，日方调查员沿途都不能观看，况且，所经之处，驻军都派有步哨，警戒森严。到达丸一药房后，日调查员松浦对于中野卧室内所陈设之物及往来书信，检查极为周密，并要求我方准其带走丸一药房三本日记部及中野的七封书信，红、白台布各一块(台布上有斑点少许，日方认为是血斑。)上午十一时，双方到爱生院中野葬处开棺检视尸体，后日方要求我方代将尸体火化，尸灰分为二瓶，一交死者家属，另一交日舰带返日本，此事凌即命当地一警长妥办。

此时，日方要求将申野遗属带返日舰，凌士芬诚恐日人教唆她们作不利于我国的供述，俾日方有所藉口，便决意先行问话录供，并一一作为记录，中野之妻女除了陈述其家的情况及中野被刺之经过外，余均无不利于我方的口供。当日下午四时，中日双方调查员各返本舰，日方还带中野的长子、长女随同到“嵯峨舰”上。

次日晨，双方仍会合调查，先后在丸一药房及市商会处召集各关系人物问话，探询此案真相，被询问人有：北海代理公安局长郝叔修，商会主席陈寿卿，法院首席检察官余睿英等，其供词亦一一记录在案。

同日下午，双方在海关税务司还先后询问了外籍人士：税务司长霍史斯、

德国牧师戴天康、美国人海尔登女士，他们的供词对我方有利，戴天康还指斥日本的侵略政策，使日人大失所望。

由于得不到当地群众的支持和军政当局的协助，凌士芬无法弄清事件的真相，最后只能模棱两可地作出如下结论：“综观各方供询及秘密调查所得，中野之死，其原因不外三端：第一死于劫杀……第二死于债务……亦未可知，第三死于暴徒……亦殊可信。”（注6）

调查结束，日方调查员于暮色朦胧中带同中野尸灰及其遗属返日舰，并即起航返广州，其余六艘日舰亦相率它去。

二十五日，凌士芬所乘“福安舰”起航归省，第二次调查至此结束。

中日外交交涉及结案经过

“北海事件”发生后，日本方面异常惶急，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广东余汉谋当局进行了频繁的外交磋商。九月二十八日，日本外相有田发表谈话，称在我国发生的一系列反日事件“其中数事件为共产党图谋离间中日关系……现即应采取断然步骤，除其根患……”并提出“中日合作制止共产党活动实属必要。”（注7）要胁以武力解决这些纠纷。

鉴于当时情势，蒋介石一方面安抚日本人，嘱不要急躁行事，以免共产党从中利用；另一方面则抓紧解决广西问题，对李宗仁、白崇禧又拉又压，使其妥协，逼令他们调走十九路军，接着，蒋介石又令广东余汉谋调派两个师向北海推进，扬言武力解决，后十九路军被迫撤离，李济深、蔡廷锴再次赴港，翁照垣、丘国珍被解职，由此可见蒋介石屈辱外交之一斑。

此后，“北海事件”经过多次交涉，直到十二月三十一日双方才正式外交换文结案，由国民党政府给予中野遗属三万元抚恤费。（注8）哄动一时的“北海事件”就这样结束了。

结束语

“北海事件”是十九路军中爱国将士和进步分子在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下，在北海进步青年学生、各界群众的支持下而采取的一次抗日正义行

动。“北海事件”又是当时全国一连串反日事件中的一环，与全国的抗日形势紧密相连，其目的在于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给一味投降卖国的蒋介石政府制造外交困难，掀起反蒋抗日之热潮。“北海事件”是顺应北海民众强烈的抗日情绪而发生的，反过来，它又给北海、合浦等地的抗日救国运动很大的影响，促进了这一运动的高潮。一五九师进驻后，公开的、热烈的群众抗日救国运动虽然被压制下去，但进步潮流却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着，尤其是北海的进步青年学生，他们更加冷静，更加善于思考，更加坚定地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此后，北海的进步学生运动、抗日救国运动更加深入，进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

注1：宣侠父，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共产党员。一九三三年任东北民众抗日同盟军军委常委兼第五师师长。一九三五年在香港组织并参加李济深等发起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进行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一九三六年随李济深入广西。一九三八年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任少将高级参谋，由林伯渠同志直接领导，同年八月一日被特务暗杀。

注2：见上海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救亡”情报第一版。

注3：见外交部谢和庚所撰写的“抗战前我和宣侠父同志在广西活动简述”一文。

注4：张梅生，又名张孤梅，一九三三年入团，一九三八年参加新四军，一九三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末期任人民解放军某师政委，一九五九年后任福建省福州大学党委书记，文化革命期间被迫害致死。一九八一年中共福建省委已为其平反恢复名誉，并确定张梅生参加革命时间是从一九三三年入团时算起。

注5、6：见凌士芬一九三六年所撰写的“调查北海日侨中野顺三被害始末记”一文。

注7：见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南京“中央日报”。

注8：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南京《中央日报》。